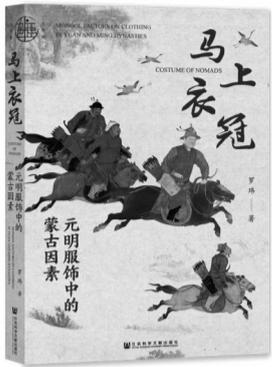


衣冠里的权力审美



《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12月
罗玮

洪武元年，朱元璋发布谕令，“诏衣冠如唐制”。洪武三年，礼部进一步细化，“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赤色为宜”。单从法理角度理解，明朝对蒙元服饰似乎没有继承关系。

然而，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玮沉潜索隐，在本书中详细展示了上百幅各

类元明服饰的高清图像史料，证明元朝时期，蒙古族具有鲜明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式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服饰行用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蒙古服饰并没有随着元王朝的崩溃而在汉地销声匿迹，相反却以不同形式继续在明代社会中广泛传播流用，其影响甚至还延伸到了清代，并在几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蒙元服饰在汉地的推广普及，必离不开权力审美的示范效应。随着元朝的建立，“虽然元朝对汉族民众服饰的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甚至冕服公服式样多仿效唐宋制度；但在掌握政治权力的蒙古贵族统治下经过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南北汉族人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上层的影响，沾染些所谓的‘胡风胡俗’”。率先作出改变的往往是那些士大夫。经过岁月洗礼，士大夫衣着慢慢向蒙古习惯靠拢，以此冀望获得政治前途。

蒙元服饰在汉地的渗透，并不全然依赖高压和权力示范，其本身也有某些优势。除了劳动便利因素的选择外，“蒙元时代的很多史料披露出蒙古服饰行用的一大特点是没有等级、社会通用”。对于渴望缩小等级差距的中下层民

众而言，蒙元服饰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载体。

当然，汉地对蒙元服饰的接受并不是全盘照收，常常会结合实际予以适当改造，比如答忽。罗玮指出，汉地穿的绵搭裤、绵团袄、绣衲袄，“实际上与蒙古族的答忽名异而实同，是中原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以棉为材料的汉式答忽。这说明原本以毛皮为材料的蒙古答忽，在汉地结合了农耕地区的特点，产生了新的式样”。中原不像蒙古毛皮材料充盈，但也有自身优势，那就是棉织较多，相对毛皮价格更为经济。

明朝建立后，虽然明太祖努力想割断与元朝的文化联系，但有的服装已经在汉地流传开来并深入人心，禁无可禁。不过，这难不倒官员的智慧。如他们“论述瓜皮帽起源时，大多援引明人旧说，认为其为明太祖所创。这种把某一历史事物的创造发明归结为某些杰出人物是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十分常见的叙述模式”。另一方面，为给那些由蒙元流传于中原的服装寻找法理正统性，“明代士大夫对蒙元样式的服饰赋予了新的‘起源’，直接攀附上宋制甚至唐制”。

明朝对蒙元某些服饰的继承有时会采取适当的改造策略。蒙元辫线袄并没有随着元朝的崩塌而淡出汉地，甚至成为明朝宫廷仪卫制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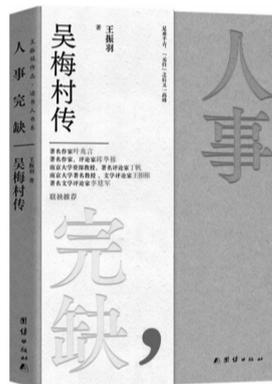
不过，此时他们给这种制服安上新的别名。辫线袄因“密密打作细折”“其华丽而又适合骑马的袍服特点，引起了明代社会上层极大的注意”。于是，他们对这种服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最终形成曳撒和褶子衣。有的改造“登峰造极”，如蒙元的云肩不仅为明朝所保留，“甚至影响到明朝皇室类最高级的汉族服装，进而出现了明代的‘云肩龙袍’”。

虽然有禁令在先，但明朝对蒙元服饰的继承是贯穿于各个阶层，包括云肩、辫线袄、瓜皮帽、质孙服、直檐大帽、卷檐帽和板中等。也就是说，蒙元服饰的“顽强生命力”一部分来自于士大夫的示范，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民间的行用体验。

本书梳理了大量史料，但也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在长期历史分分合合的交融中，蒙元服饰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种文化的渗透影响，那么，蒙元服饰的更早源头又是什么呢？蒙元初立时，对唐宋服饰有所仿效，到底是哪些仿效，本书未见阐述。如此，明朝士大夫以承唐宋之制而选择性接纳蒙元服饰似乎也非空穴来风。再者，如果我们换种角度看，中原民族文化对北方游牧文化服装的认可，更像是一种文明包容消化吸纳的润物细无声。

□禾刀

“天下大苦人”吴梅村的心路历程



《人事完缺：吴梅村传》

团结出版社
2024年3月
王振羽

王振羽先生的新著《人事完缺》，是一部关于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吴梅村的人物传记——吴梅村其人，一生的经历既与明末清初的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又形象地折射出王朝鼎革之际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共同际遇。王先生为吴梅村作传，则以明末清初的相关史料为基础，以吴梅村平生的经历和诗文创作为线索，力求设身

处地体察吴梅村的内心世界，思吴梅村所思、想吴梅村所想，以最大可能地走近吴梅村，走进吴梅村所处的悲情时代。

吴梅村一生的高光时刻，无疑是在崇祯四年他高中进士，并被崇祯皇帝钦点为榜元，进而假归娶亲、衣锦还乡之时。王先生为吴梅村作传，即从吴梅村的高光时刻开始写起，将吴梅村的人生境遇置于时代背景之下，重点关注他人生经历中的重大变故与艰难抉择。吴梅村少年得志，荣极一时，尽管在崇祯朝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并不容易，但他的前半生还算顺风顺水，并没有遇到过太多的波折。就像易代之际为数众多的文人士大夫一样，王朝鼎革是为吴梅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是以身殉国，还是苟且偷生，抑或心怀故国、不事新朝，以遗民的身份终老，成为彼时每一个文人士大夫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吴梅村是一位文人，在他的身上既带有浓郁的文人意气，同时又不乏一般文人所常见的弱点，诸如性格懦弱、患得患失等等。吴梅村亲眼目睹明末朝廷的腐败乱象，他曾经想远离宦海，做一名置身事外的隐士，但朝代更迭却彻底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吴梅村深受皇恩，易代之际显然承担了更大的压力，经受了更多的痛苦。因为性格懦弱，吴梅村做不成烈士；因为家室所累，吴梅村做不到“矢志不渝”。吴梅村本来打算以遗民的身份苟活于世间，但在清廷的威逼下，最终却不得不违心出仕，可以说吴梅村的个人选择既是时势所迫，同时也未尝不是他的性格使然。

吴梅村向以“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名享誉文坛，他本人的诗作更有“诗史”之称，其诗文既贯穿了他一生的经历，亦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时代记忆。比如吴梅村的长篇歌行《琵琶行》《圆圆曲》《殿上行》《临江参军》等等，或者记述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者讲述时逢乱世的个人遭遇，这些诗歌不仅蕴含着深厚的个人情感，且均能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吴梅村其实是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在《人事完缺》中，王先生即通过对这些诗歌的解读，为我们展示出明清易代之际的真实面貌，同时也让我们把握到吴梅村在沧桑巨变中肝肠寸断、彷徨无地的心路历程。

事实上，王先生始终是抱着同情与理解的

态度看待吴梅村的人生选择，进而解读吴梅村平生的诗文创作的。生逢天崩地解的大时代，吴梅村既没有像陈子龙和夏允彝那样慷慨赴死，也没有像徐枋和冒辟疆那样固守素志，他或许的确不是一位勇者，当然更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铁血男儿。然而在王先生眼中，吴梅村的人格固然并不完美，甚或不无瑕疵，但吴梅村知耻，而且极具忏悔意识和自省意识。他虽然最终沦为一个变节者或曰“两截人”，但晚年把自己称作“天下大苦人”，甚至彻底否定自己后半生的选择，这种敢于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精神，依然值得肯定。

清人赵翼在他的《瓠北诗话》中尝言：“梅村当亡国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签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踟躇地之意，没齿不忘，则心与迹固皆可谅。”已经对吴梅村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而王先生为吴梅村作传，他首先关注的同样是吴梅村身处的环境和内心的挣扎，王先生将书名取作《人事完缺》——所谓“完缺”云云，即已包含着世间人事皆无完美、多有缺陷，故不可求全责备之意，以此作为他评价吴梅村的重要标准。

□王淼

“俄罗斯”之名从哪里来



《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
肖瑜

作为邻国，俄罗斯经常被提及，国人并不陌生；若从革命史看，苏联与中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追问俄国的历史，恐怕大多数人只能想到“沙皇”等名词，缺乏整体性概观。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肖瑜的新作《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带我们追溯了古罗斯的历史，更加全面地理解俄罗斯的起源。

“基辅罗斯”的“基辅”即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地区，公元882年，留里克王朝的王公奥列格占领基辅，并宣称“让基辅成为罗斯众城之母”。19世纪之后，史学界普遍将奥列格建立的国家称为“基辅罗斯”。这一名称中的“罗

斯”，首先可以作为历史政治概念，指由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其次，在后来的演进中，“罗斯”可以泛指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所有部族，作为民族概念而存在；最后，“罗斯”一词也是作为国家概念的“俄罗斯”名称之源头。

基辅罗斯所建立的国家形态，如果类比中国历史，很像西周的封建共主。在各国的早期历史中，往往存在多中心、非统一局面。在当时东欧的重要商路上，并非只有基辅一座重镇，位于今俄罗斯西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在随后数百年间，一直拥有着发达经济、充足人口，但其政治地位逊于基辅。简言之，罗斯民族通过对基辅中心地位的确立，自此具备了政治上的统一观念。

奥列格建立共主式国家后，动员能力更强，再加上他个人的卓越才能，基辅罗斯开始在欧洲崛起。奥列格当政期间，主导了罗斯与拜占庭的战争，双方战战和和，拉扯数年，在古罗斯重要史料《往年纪事》中，便保留有双方签订过的合约内容。不过，在随后伊戈尔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执政期间，战争仍在延续。早期国家政权，往往通过整合局部区域，形成与异国异族的界限而逐步确立，战争则是塑造自我的必要途径，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利益，罗斯与拜占庭都处于竞争关系，战争便难以消弭。

基辅罗斯的国家政治领袖是基辅大公，理

论上全域全境的其他公国，视其为共主。然而，共主威望不是凭空而来，而要靠真正的政治强人予以巩固。毫无疑问，基辅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大公，便是弗拉基米尔一世与“智者”雅罗斯拉夫。

从私德而言，弗拉基米尔甚为糟糕，在夺权和战争中屡有阴谋。但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弗拉基米尔尤为为重要——正是在他任内，罗斯转变了古已有之的多神教信仰，正式皈依基督教信仰。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大致可从两方面看，就国家而言，罗斯需要一种新的全民宗教来凝聚人心；就个人而言，弗拉基米尔思考自己过往的行为，谋杀兄长、撒谎成性、纵欲无度，十分担心遭受报应，而基督教宽恕罪过、提供重生的教义，自然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

俄裔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认为，弗拉基米尔和他的臣僚们最终选择了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翼，他们为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进入敞开大门。基辅的文学、艺术、法律、礼仪和习俗从此都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

以后见者视角看，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确立了罗斯民族的信仰。1453年，伊凡三世迎娶东罗马末代君主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自此成为“第三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开始作为古罗斯的国家图腾。今天，我们将俄罗斯的信仰描述为“东正教”，其实就俄国自身而言，不存在东与西的

区别，罗斯才是延续基督教血脉的唯一“正教”。在此意义上，弗拉基米尔一世的皈依，正是信仰的肇端。

雅罗斯拉夫也是一位划时代的领袖，他对内颁布《罗斯法典》，稳定政局，对外促进与拜占庭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基辅的地位在欧洲蒸蒸日上。雅罗斯拉夫统治的35年，堪称罗斯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在他死后，教堂的铭文写道：“我们的沙皇故去了。”这是“沙皇”称号第一次被用于罗斯的统治者。

基辅大公的统治性地位，很大程度上由君主个人能力维系，这就会造成权力出现真空时，既定继承规则被无视与践踏。雅罗斯拉夫遗嘱表明，他要求继任者以年龄顺序依次执掌权力，即“年长者继承制”。然而掌握权柄的大公，希望将权力传给子嗣而非兄弟；年龄相差无几的兄弟，又都觉得自己有实力夺取大公之位，于是，便产生了无休止的争斗。基辅罗斯从雅罗斯拉夫到莫诺马赫之间的时期，基本都处在权力争夺的动乱中。基辅罗斯的政体本就类似于分封制，分离主义的苗头始终存在，各地大公的实力不容小觑，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争夺的激烈。

在基辅罗斯的最后阶段，崛起于苏兹达里大公国的博戈柳布斯基，攻陷并焚毁了基辅，他自己则回到弗拉基米尔城，使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自此，基辅罗斯的政治中心地位、基辅大公的领袖地位，也宣告结束。

□赵慕宇